



第二幅，堪称孤品，尤为珍稀的是这幅海报集孤品与错版为一体，你仔细看，‘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’中的‘团’误写成了‘国’，印刷厂在制版印刷过程中也未发现，结果就成了难得的错版。因此极具艺术观赏、文献和收藏价值。”

随着收藏经验和经济能力的增长，陈氏夫妇慢慢把收藏范围延伸到与电影有关的其他遗存：《大众电影》和各种画报、电影拍摄台本、电影摄制和放映器械、电影拷贝及与电影有关的其他藏品。

陈红龙把上千本五六十年代电影拍摄（翻译）台本整齐地码在桌子上，令我大开眼界。拍摄台本又叫分镜头台本，是导演拍摄电影时的依据；电影拍摄完成后，拍摄台本由制片厂存档，相当于某部电影的拍摄档案。

陈红龙收藏的台本中，有许多或大名鼎鼎或耳熟能详的电影：民国时期拍摄的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《乌鸦与麻雀》；新中国建立后的大型音乐史诗剧《东方红》，故事片《南征北战》《地道战》《智取华山》《铁道游击队》等；外国电影《列宁在 1918》《流浪者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箱根风云录》《被开垦的处女地》等。

他收藏了自创刊号至今的全部《大众电影》，还有一些民国时期电影演员的照片和剧照。尤为难得的是，他的藏品中有著名电影演员王晓棠和秦怡分别在上世纪 80 年代写给著名导演岑范的两封亲笔信。藏品中有一架上世纪 40 年代产于日本的 8 毫米电影摄影机，体积只比香烟盒大一点点。电影放映机数量虽不多，但型号分别有 35 毫米、16



左图：自创刊号至今的《大众电影》杂志。
摄影 / 陈慈林

毫米和 8.75 毫米，涵盖了基本规格。

那些拷贝啊，怎么办

电影拷贝是电影文化遗存的核心元素，3 年多前，他通过拍卖，购买了某电影公司清理库存出售的 1.6 万余部老电影拷贝。这批电影拷贝大部分是 35 毫米，也有部分 16 毫米和 8 毫米；既有国产片，也有译制片。为把拷贝运回来，仅运费就花了二三万元。这批拷贝使他的光影藏品形成完整系列，成为名符其实的“光影宝库”。

陈红龙说，上世纪 90 年代国内许多电影公司改制，近年来电影数字化升级，电影传统体制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，许多珍贵的电影拷贝、放映器材和与此有关的文化遗存日渐散失、湮灭，目前是抢救电影文化遗存的重要历史窗口期。他如此定义自己的行为：“我们就像是串珍珠的人，把散落在各地的老电影资料收集起来，汇聚成一个浩大的电影资料宝库，然后把它们留给后人。”

前几天，陈红龙带着“康城老

电影”阿梁、老放映员胡渭泉和谈祥耀，到临时库房取拷贝。临时库房是一间七八十平方米的半地下室，打开库门，一股酸甜的老胶片气息扑面而来。几十平方米的地上随意堆放着无数拷贝铁箱，足有二三米高。陈红龙说，电影公司未提供拷贝清单，拷贝运来后，也没时间清点整理，要拷贝只能自己找。因无合适存放场所，堆放在临时仓库内已经 3 年多了。

现状令人担忧：许多铁盒（箱）锈迹斑斑，有些已不能看出片名。老胡与老谈爬到堆积如山的铁箱顶上，找出几个 16 毫米拷贝铁盒，有的拷贝已发硬、板结，情况非常严重。折腾半个多小时后，总算挑出 13 部拷贝，因堆压严重，无法挑选，只能拿到什么算什么。

胡渭泉说，保存电影胶片的基本条件是避光，阴凉，通风，干燥，再加必要的消防设施。这个密不通风的临时仓库显然严重不达标。当务之急，是把所有拷贝清理一遍：开箱取出拷贝，倒一次片，让胶片通风透气；断片和已损齿孔进行修补剪接；箱体油漆保养，标上片名，登记造册。再选择符合条件的安放场所，切实进行保护。如果继续维持现有状态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陈红龙说：“我们 20 多年耗巨资收集的珍稀电影遗存，既属于我们夫妻，也属于国家和后代。我们想千方百计保护好这些遗存，进一步开发利用这些资源，这也是我们愿意为‘康城老电影’无偿提供拷贝的原因。如今保护 1.6 万部老拷贝迫在眉睫，但已远超我们的能力。企盼文化部门和有识之士携手参与，共同做好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。”